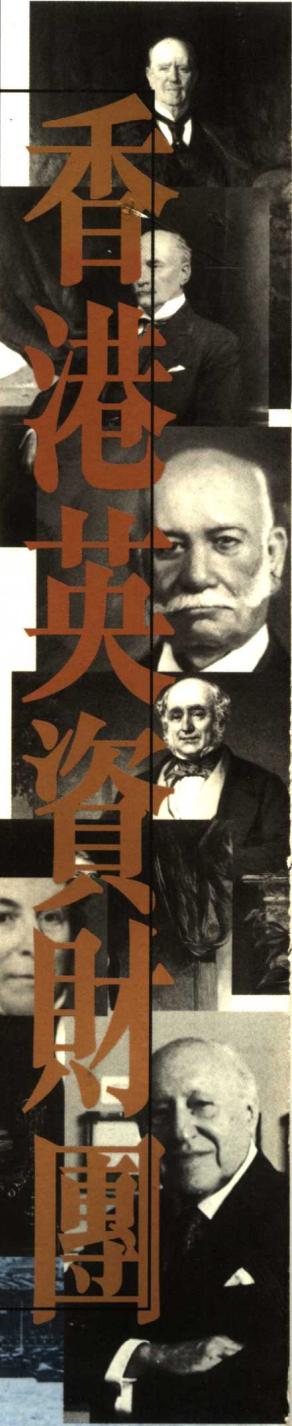


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六年

馮邦彥著

香港廿五資財博



F127.658-09

~~F341~~

香港英資財團

一八四一年至一九九六年

馮邦彥著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李 安
裝幀設計 了 塵

書 名 香港英資財團(1841~1996)
著 者 馮邦彥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排版製作 御印堂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西111號華富商業大廈9樓901-903室
印 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 次 1996年7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1996年11月香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規 格 大32開(140×210mm)520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04·1335·0
 © 199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前言

1987年，筆者首次踏足香港。香港中區的繁華鬧市、維多利亞海港的璀璨夜景，都給筆者留下難忘的深刻印象。

當時，筆者是應香港東南經濟信息中心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楊振漢先生(楊振寧博士的胞弟)之聘，前往該公司任經濟分析員，從事香港經濟研究，聘任期是一年。筆者以為這只是一次短期的旅程和考察，不料自此就在香港工作、生活了8個年頭。這期間，香港正處於九七回歸的過渡時期，各種政治、經濟力量正在激烈角力。這使筆者獲得一個極難得的機會，直接貼近並親身感受香港經濟跳動的脈搏，從中領悟它的勃勃生機和所面對的困難。

使筆者對香港的資本、財團，尤其是英資財團產生最初認識的，是初到香港的一個陽光明媚的星期天。在香港一位朋友的陪伴下，筆者遊覽了香港經濟的心臟區——中環。在美侖美奐的置地廣場，朋友指着瀕臨海港、高聳的康樂大廈(今怡和大廈)說：這就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怡和洋行的總部所在地。筆者不期然聯想起英國著名小說家克雷威爾(James Clavel)筆下的《豪門》(Noble House)，據說該部小說所描述的扣人心弦的權力鬥爭和商戰，就是以這家古老而神秘的洋行為背景展開的。

1987年10月全球股災前夕，香港恆生指數從3,949.73點的歷史性高位滑落；然而，著名的英資地產公司置地的股價卻逆市標升，有關收購傳聞不絕如縷。連怡和洋行旗下的主力、號稱香港地產“皇冠上的明珠”的置地都遭到華資財閥的狙擊，顯示英資財團正面對某種重要的轉變，這使筆者對香港的英資財團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並開始了持續而廣泛的搜集有關資料的工

作。1994年，筆者攜帶沉重的資料返回廣州暨南大學，第一個願望就是完成本書的寫作。其時，香港已臨近九七，一個舊的時代即將完結，一個嶄新的時代即將開始，正是恰當的時機對香港英資財團逾一個半世紀以來的歷史作一個總結。

本書試圖從歷史與經濟相結合的角度，對香港的英資財團作一個客觀、平實的概述和分析。全書共分七章：第一、二章“奠定百年基業”和“向大陸擴張”，以怡和、匯豐、太古這3家歷史最悠久、實力最雄厚、影響最深遠的英資財團為主線，概述香港英資財團的崛起、發展及其歷史背景。第三、四章“雄踞香江”和“從巔峰滑落”，敘述英資財團走向鼎盛及從高峰滑落的歷程（僅從總體而言），分析了其背後蘊藏的深刻的時代及經濟的原因。第五、六章“部署國際化戰略”和“穩守香港核心業務”，着重說明英資財團在過渡時期的種種策略性部署及其利弊得失，以及對香港經濟所產生的影響。第七章“歷史的回顧與前瞻”，則分析了英資財團在香港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九七後其所面臨的挑戰和發展機遇。

一部香港英資財團的歷史，某種程度上就是香港近現代政治、經濟歷史的一輯極其生動的側影，從中反映了逾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經濟所經歷的深刻變化、各種資本與財團勢力的激烈競爭和角力，以及中英兩國的國力在遠東地區的此消彼長。筆者希望藉此書將這種深刻的變化再現於讀者面前，並從中得到某種歷史性的啟示。如果本書能對讀者有所裨益，筆者將深感欣慰。

在這本書出版之際，筆者首先深切感謝香港三聯書店總編輯趙斌先生和本書責任編輯。本書能夠順利完成，如期付梓，是與他們的大力支持、熱忱協助和辛勤努力分不開的。同時，筆者還深深感謝為本書的完成提供協助或資料圖片的香港大學香港歷史研究室、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館長尹耀全先生、廣東省中山圖書館特藏部副主任倪俊明先生、著名收藏家鄭寶鴻先生、

香港史專家高添強先生、青洲英坭有限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香港渣打銀行、英之傑太平洋、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中國銀行、中國航空(香港)有限公司、港龍航空有限公司、《資本》雜誌、《文匯報》以及許多新相識的朋友的熱情幫助。沒有他們，本書的內容，特別是照片，不可能做到現在這個模樣。最後得香港經濟學社主席胡國亨先生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李培德博士在百忙中撥冗為本書撰寫推介文字，在此一併致謝。

由於筆者水平有限，其中定有不少疵誤和錯漏之處，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馮邦彥謹識

1996年6月

本書作者馮邦彥，廣東鶴山人，現任廣州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所副教授，及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港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等職。1987年至1994年間，曾應聘赴港任職香港東南經濟信息中心等機構，從事香港經濟研究，在香港及內地先後發表論文近百篇。研究範圍為香港的資本與財團。主要著作有《香港大辭典》(廣州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關“資本與財團”部份。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奠定百年基業

一· 販賣鴉片起家	1
二· 香港早期的英資洋行	2
三· 航運、倉儲碼頭和船塢業	15
四· 匯豐銀行的創辦	29
五· 地產和酒店業	39
六· 英資對公用事業的投資	50
	58

第二章

向大陸擴張

一· 上海成為進軍大陸的大本營	73
二· 怡和洋行：“洋行之王”	74
三· 太古洋行：航運業的巨擘	90
四· 匯豐銀行：金融業的壟斷寡頭	105
	119

第三章

雄踞香江

一· 戰略重心轉移：重返香港	135
二· 英資四大行：怡和	136
三· 英資四大行：和黃	145
四· 英資四大行：太古	159
五· 英資四大行：會德豐	168
六· 匯豐：支配香港經濟的金融帝國	183
七· 壟斷香港經濟命脈	191
	207

第四章	從巔峰滑落	213
	一·華資財閥勢力抬頭	214
	二·和記黃埔首告陷落	232
	三·九倉、會德豐相繼失守	251
	四·怡和置地困守危城	266
	五·從巔峰滑落的原因	277
第五章	部署國際化戰略	287
	一·怡和：遍冊百幕達	289
	二·匯豐：結構重組	303
	三·加快海外投資步伐	312
	四·“帝國還鄉戰”	325
	五·從“上市豁免”到全面撤離	342
	六·國際化戰略的影響	352
第六章	穩守香港核心業務	359
	一·太古：邀香港中信加盟	360
	二·香港電訊：淡化英資公司色彩	387
	三·嘉道理：對香港投信心一票	406
	四·英之傑：最後一家英資大行	426
	五·穩守香港的戰略考慮	433

第七章	歷史的回顧與前瞻	439
	一·英資在香港經濟中的地位	440
	二·九七的挑戰與機遇	464
附錄	香港英資財團大事記	487

第一章

奠定百年基業

1840年爆發的中英鴉片戰爭，導致近代香港的開埠及香港英資財團的誕生、崛起。早期香港的英資洋行，憑藉當時英國強大的國勢，從對中國進行的大規模鴉片貿易中牟取了驚人的利潤，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隨着香港成為遠東著名的貿易轉口港，香港英資洋行迅速將投資的觸角伸向航運、倉儲、銀行、地產、酒店及各項公用事業，並開始建立起逾150年的龐大基業。

一・販賣鴉片起家

香港英資財團的誕生、崛起，最早可追溯到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貿易。當時，東西半球的兩個大國，正為其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在南中國緊張地對峙。

十九世紀上半葉，中英兩國的緊張對峙中，取攻勢的是英國，它早已完成了工業革命(1760-1840年)，並在帶有海盜掠奪性質的海外貿易以及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中迅速崛起，一躍而成為全球最強大的新興工業國家。到十九世紀初，憑藉着強大的艦隊和制海權，英國不僅控制了西起好望角東至遠東的廣大海域，而且征服了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大片殖民地，佔領了直布羅陀、馬爾他、錫蘭、檳榔嶼等重要戰略或商業據點。1819年，英國在佔領了通往遠東的重要基地新加坡之後，即以印度為基地，將其擴張勢力，直逼中國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的古老國家。為了打開中國市場，英國東印度公司以及一批所謂“自由商人”(Free Merchants)(1) 當時正對中國進行着大規模的、猖獗的鴉片貿易和鴉片走私活動。

取守勢的中國，剛經過了清皇朝輝煌的“康雍乾盛世”，從十八世紀末開始進入了衰落期。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後，由於連續的自然災害和鴉片輸入的不斷擴大，中國社會日益動蕩不安。清政府害怕外國勢力的侵入會加劇不穩

的情勢，企圖以加強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維持統治。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規限極嚴，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於廣州一處，對外貿易亦規定由清政府特許的行商組成的“公行”壟斷進行。然而，日漸腐敗的官僚機構，並未能制止迅速擴大的鴉片貿易和鴉片走私活動。

鴉片戰爭前英國對華的鴉片貿易

事實上，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貿易，早在1773年已由東印度公司展開。東印度公司的前身是倫敦東印度官商貿易公司，創辦於1600年，由英女王批准成立，旨在開闢印度和中國的貿易。1702年它和英國東印度貿易公司合併，以後稱為東印度公司，並壟斷了英國對東方的貿易專利權。1715年，東印度公司在廣州設立商館，正式開展對華貿易。初期，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主要是向中國輸入英國的毛織品、鉛、錫、銅等金屬品，以及印度的棉花、檀香等產品；並將中國的茶葉、絲和瓷器等銷往英國。1760年開始，英國正值工業革命之始，從農業和手工業經濟轉變到以工業和機器製造業為主的經濟，更是急需為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品尋找市場。可是，由於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對英國工業品的需求量微乎其微，而中國出產的茶、絲在英國的需求量卻日益增長，是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長期處於逆差之中。1804年以前，東印度公司每年都必須從歐洲將大量白銀輸入中國，以彌補對華貿易的逆差。為了改變這種情況，1773年東印度公司確立鴉片專賣制度，首次從加爾各答向廣州輸入鴉片。他們發現，鴉片不但比工業品易於銷售，且利潤豐厚。自此，中英貿易形勢開始逆轉。

鴉片貿易的巨額利潤，刺激着貿易額的大幅增長，1773年，外國輸入中國的鴉片僅1,000箱，到1790年已增加到4,045箱；其中，東印度公司佔絕大部份，打破了最早向中國輸入鴉片的葡萄牙人的壟斷，成為對華鴉片貿易的主角。1796年，清政府宣佈禁煙，東印度公司為了顧全對華貿易，表面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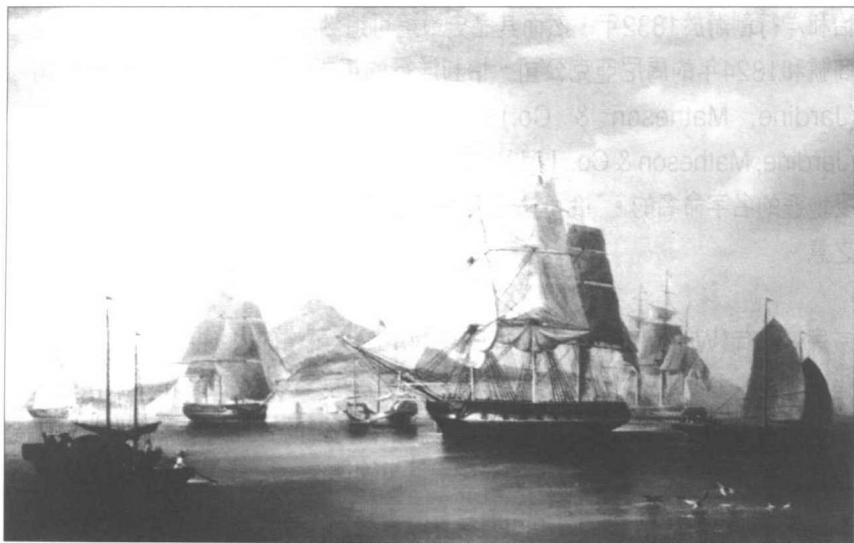
停止鴉片貿易，實際上轉由它發給特許證的自由商人進行。這批自由商人以更積極的“進取態度”，通過走私、賄賂等違法手段，繼續向中國大量輸入鴉片。

在東印度公司和自由商人的全力推動下，對中國的鴉片輸入逐年遞增。據統計，1800年輸入鴉片為4,570箱，1822年為7,773箱，1831年為16,550箱，到1834年竟達21,885箱。⁽²⁾ 從1773年到1834年東印度公司壟斷鴉片貿易的整個時期，輸入中國的鴉片從每年的1,000箱急增到逾21,000箱，60年間增長近21倍。由於鴉片暢銷中國，英國對華貿易已從逆差變為順差，中國白銀外流日趨嚴重。

1834年4月22日，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被英國政府正式廢除，使鴉片貿易完全向英商開放，實際上開始了英、美鴉片販子向中國大規模販運鴉片的新時期，鴉片貿易和鴉片走私不僅在數量上呈現驚人的增長，範圍還從澳門及廣州黃埔港外的伶仃島擴展到廣州城外及東南沿海，一直到直隸和東北沿海一帶，煙毒迅速在中國泛濫起來。

以怡和為首販賣鴉片的三大洋行

由鴉片販子們組成的私人公司或洋行，雖然在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被廢除之後才嶄露頭角，但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們已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肆活動，成為東印度公司走私鴉片的主力軍。1834年以前，這批英商已掌握了一半以上的中英貿易。1834年東印度公司從廣州退出後，販運鴉片的外資洋行立刻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從1833年到1837年，英資洋行從66間增加到156間，美資洋行也增加了不少。這些洋行中，最著名的是英資的怡和洋行、寶順洋行和美資的旗昌洋行。



▲ 鴉片戰爭前停泊在廣州伶仃洋面的鴉片煙船。

怡和洋行創辦於1832年，然而其歷史最遠可追溯到1782年的科克斯·賴德商號和1824年的馬尼亞克公司。怡和洋行的正式名稱是渣甸·麥地遜公司 (Jardine, Matheson & Co.)。1906年後改組為渣甸·麥地遜有限公司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是以其兩個創辦人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麥地遜的名字命名的。“怡和”是它在廣州註冊時所用的行號，取“快樂和諧”之意。

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 1784-1843年)，蘇格蘭人，早年畢業於英國愛丁堡的醫科學校，1802年他離開英國前往印度，先後在東印度公司往來於加爾各答和廣州的商船“布魯斯威克號”和“格拉頓號”任隨船醫生。當時，東印度公司壟斷了英國對東方貿易。根據英國法律，破壞這種專利權的人將被處以絞刑。不過，東印度公司對職員訂有特別優待章程，允許每人每次夾帶私貨兩箱。渣甸眼見走私鴉片所牟取的暴利，自然不滿足區區這種優待。1817年渣甸脫離東印度公司，加入自由商人行列，開始了鴉片走私的生涯。

他首先和曾任東印度公司醫生、已成為富商的老南海公司老闆托馬斯·威汀，以及孟買鴉片商弗拉姆吉·科瓦斯吉合夥，購買了一條“薩拉號”商船，從事鴉片走私活動。很快，“薩拉號”成為加爾各答至伶仃島快速航線上的一條著名的鴉片走私船。當時，渣甸主要在孟買做生意，他把中國方面的業務委託給荷林渥爾茲·馬尼亞克代為經營。荷林渥爾茲是他哥哥查理斯的查理斯·馬尼亞克公司的合夥人。馬尼亞克兄弟是從十八世紀以來就常駐澳門和廣州的老牌鴉片販子。1824年查理斯死後，荷林渥爾茲將公司改名為馬尼亞克公司，同時決定退休回國，為此，他物色了渣甸為公司的合夥人。1827年渣甸加入馬尼亞克公司，負責管理該公司在廣州的業務。這對於渣甸是一個極好的機會，因為當時的形勢已漸趨明朗，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的貿易壟斷已接近尾聲。

怡和洋行的另一個創辦人詹姆士·麥地遜(James Matheson, 1796-1878年)，也是蘇格蘭人，早年畢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麥地遜亦曾在東印度公司任職，1815年他取得了自由商人的資格，並加入他叔父在加爾各答開設的公司。1818年他離開叔父的公司前往廣州，開始從事鴉片走私活動。1826年麥地遜結識了渣甸，兩年後亦加入了馬尼亞克公司，與渣甸合夥搞鴉片走私，生意越做越大。兩人不僅在廣州一帶銷售鴉片，還僱用德國傳教士沿海北上至渤海灣，走私販毒，積累了大量財富和資本。1830年，渣甸在廣州致函英國友人，聲稱鴉片走私是“我所知道的最穩妥又最合乎紳士風格的投機”。他在信中說：“在好的年頭，我估計每箱鴉片的毛利甚至可達一千銀元之多。”走私鴉片的生財之道，不僅在於販賣，他們同時操縱市場，投機買賣，一轉手間，即獲暴利。

1832年7月1日，渣甸和麥地遜在馬尼亞克公司倒閉的翌日，在廣州創辦了怡和洋行。當時，公司的主要合夥人還有渣甸的外甥安德魯·約翰斯頓和麥地遜的外甥亞歷山大·麥地遜。怡和洋行的業務發展極快，1834年東印度公司退出後，怡和洋行即取代東印度公司，成為英商對中國進行鴉片貿易的主角。就在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被廢除後的3個月內，怡和洋行運往廣州的貨物達75船，佔當時廣州對外貿易總額的三分之一。⁽³⁾到1837年，怡和洋行已擁有資本261.3萬元，其中大部份投資於船隊和鴉片等貨物上，它擁有的鴉片走私快船，包括著名的“奧斯丁號”、“楊上校號”、“海斯夫人號”、“紅色海盜號”、“勞德萊總督號”、“希臘號”、“奧米加號”、“哈里特號”、“維納斯號”以及“珊瑚號”等共12艘，頻密穿梭於加爾各答到廣州的航線上。

寶順洋行，又名顛地洋行(Dent & Co.)，是僅次於怡和洋行並可以與怡和洋行相較量的另一家著名的鴉片走私商。洋行老闆顛地在廣州是與渣甸齊名的兩大鴉片走私販之一。寶順洋行的歷史，可追溯到1807年東印度公司代理人喬治·巴林在廣州開設的巴林洋行，後因公司另外兩個合夥人莫隆奈和羅



▲ 威廉·渣甸(1784-1843)，怡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



▲ 詹姆士·麥地遜(1796-1878)，怡和洋行的創辦人之一。